



# 从“自我崇拜”到“故土与祖先”

## ——莫里斯·巴雷斯政治思想探析

宋玉芳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莫里斯·巴雷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其政治思想的发展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阶段:“自我崇拜”和“故土与祖先”。他在青年时代信奉“自我崇拜”的原则,认为人的第一任务是捍卫受到“野蛮”侵蚀的“自我”。“自我”意识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在经过几次政治浪潮的冲击之后,他最终转向以“故土与祖先”为理论支撑的民族主义,强调对根、家庭、军队和故土的忠诚。“自我崇拜”理论最终在“故土与祖先”理论中得到升华。系统分析其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内涵以及特征,有助于深入考察巴雷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民族主义政治思潮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莫里斯·巴雷斯;自我与野蛮;自我崇拜;故土与祖先;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12-0685-06

## From "self-worship" to "homeland and ancestors" : Analysis of Maurice Barrès' political thought

SONG Yuf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Maurice Barrès was a famous French writer and political activist at the turning of the 19<sup>th</sup> and 20<sup>th</sup> centuri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elf-worship" and "homeland and ancestor". He believed in the principle of "self-worship" in his youth and considered the first task of human beings was to defend "ego" eroded by "barbarism". "Self-awareness" was the basis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After several impacts of political waves, he finally turned to nationalism theoretically supported by "homeland and ancestor" and emphasized loyalty to root, family, army and homeland. "Self-worship" theory was finally sublimated in the theory of "homeland and ancestor".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ause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nationalism thought, contributes to deeply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Barr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ism political thought at the turning of the 19<sup>th</sup> and 20<sup>th</sup> centuries.

**Key words:** Maurice Barrès; ego and barbarism; self-worship; homeland and ancestor; nationalism

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1923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声名隆隆的作家,同时也是活跃于当时法国政界的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在普法

战争之后法国民族复兴的特定语境下,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无论是在布朗热运动、德雷福斯事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发生或经历的重大事件中,巴雷斯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收稿日期:2019-01-03 网络出版日期:2019-05-15

基金项目:浙江理工大学“英语”品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dbts201603)

作者简介:宋玉芳(1981—),女,浙江嘉兴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国近代史、法国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角色。其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法国的政治舆论和社会价值观念。

塞伏·斯特内勒(Zeev Sternhell)<sup>[1]</sup>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明确肯定了法西斯主义的法国起源,并认为巴雷斯等人的民族主义非但没有借鉴其他国家的任何东西,反而是意大利等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模仿对象。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sup>[2]</sup>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既对巴雷斯的文学才情加以褒扬,又承认了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某些时期表现出来的极端性、排外性,最终肯定了巴雷斯在法国文学史和知识分子史上的重要地位。国内史学界目前对巴雷斯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sup>①</sup>、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sup>②</sup>,以及华南师范大学黎英亮老师<sup>③</sup>分别在他们的专著中对巴雷斯及其政治思想的不同侧面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国内仅有两篇专门论述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sup>[3-4]</sup>,但内容只是对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粗浅分析,并未对其理论成因、核心内容与影响做深入系统考察,更未结合当下国际政治形势进行经验总结或提出启示。

本文拟从巴雷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两个不同阶段——“自我崇拜”(le culte du moi)<sup>④</sup>和“故土与祖先”(la terre et les morts)<sup>⑤</sup>——展开论述,结合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自我”(le moi)与“野蛮”(les barbares)——进行分析,对法国十九世纪末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巴雷斯的政治思想做一系统梳理。并从当时法国民族主义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出发,分析巴雷斯对这一政治思潮大转型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当今法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近些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问题凸显的形势,总结并得出一些启示。

## 一、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

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不但要承受巨额的战争赔款,还要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一部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然疆界”再次被打破。一时间,“被缩小的法国”让一向自以为傲的法国人尝足了苦涩的滋味。战争的失败、外族的入侵、领土的割让,尤其是莱茵河对岸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使法国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安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复仇的目标和1870年的屈辱回忆始终伴随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起初的那些年代。巴雷斯一直以来都无法忘记,在8岁那年,“他所在的那个小城里……痛苦又惊呆的人们发现一支混杂着狼狈不堪、满身泥泞的俘虏骑兵队伍穿过小城。”<sup>[5]</sup>自那时起,

对法国失去或可能失去其伟大性的焦虑,对法国曾经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光荣的怀念,一直占据着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想的语境中心点。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创立初期,在选择政治体制、组建政府、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以及重建国家荣誉等诸多方面可谓困难重重、步履蹒跚。虽然共和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以共和理念为核心塑造民族认同感的措施<sup>[6]</sup>,但法国国内不断出现的政治丑闻依然导致民众对议会制共和国政府产生了重大的信任危机。

十九世纪中叶起,对于国家和民族衰败的忧虑情绪在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一直萦绕不散,而此现象在文学界尤为显著。法国文化民族主义者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和“魔鬼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以及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保尔·布尔热(Paul Bourget)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忧虑是对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企图用理性来解决一切现存问题的雄心壮志的质疑。巴雷斯于1885年在他自己创办的杂志《墨迹》(Les Taches)上写的一段话极好地印证了当时法国知识界为“处于衰败中的法国”焦虑的精神状态:“每个人都在平庸又相似的人生轨道上原地踏步,不带希望,只有满嘴的恶心。出生时痛苦的哭声和临终时的喘息声是唯一剩下的相对于一切不确定性的最终确定。”<sup>[7]</sup>巴雷斯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患上了“由过度的神经官能疲劳导致的病态为‘世纪病’”<sup>[8]</sup>,这种病的最主要表现便是过分悲观、精神空虚和妥协于宿命论。面对这样一种弥漫几乎整个西欧社会的衰败

① 吕一民在其与朱晓罕合著的《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中有对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作为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领袖的巴雷斯的评述。吕一民,朱晓罕.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1-43.

② 郭华榕在其独著的大部头著作《法国政治思想史》的第14章《民族主义》中,以一定的篇幅对作为法国近现代民族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巴雷斯进行探讨。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70-683.

③ 黎英亮的专著《何谓民族?——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有章节涉及到巴雷斯。黎英亮.何谓民族?——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④ Le Culte du Moi,这也是巴雷斯的第一个三部曲小说的名称,发表于1888至1891年间。包括《在野蛮人的眼皮子底下》(Sous l'Œil des Barbares, Paris: Lemerre, 1888.)、《自由人》(Un Hommelibre, Paris: Perrin, 1889.)、《蓓蕾妮斯的花园》(Le Jardin de Bérénice, Paris: Perrin, 1891.)。

⑤ 巴雷斯于1899年在法兰西祖国联盟的一次报告会上做了一场以此为题的演讲。La terre et les morts: sur quelles Réalités fonder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Paris: Bureaux de La Patrie française, 1899.

局面,一种对抗于这种颓废情绪的激烈反抗情绪在20世纪大爆发——民族主义,这股思潮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思想界消息情感的解脱出口。在法国这片即将经历布朗热运动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土地上,巴雷斯作为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思想的青年代表,经过布朗热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完成了从个人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构建了一套以祖先崇拜、血缘尊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理论。

## 二、民族主义的发端：“自我崇拜”

社会衰败在思想界的反应首先表现为青年一代的叛逆。“自我崇拜”时期的巴雷斯是反叛青年的代表。面对因循守旧、不肯进行价值革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当时被特权阶层所掌控、鼓吹爱国主义的社会,巴雷斯渴望找到一片坚实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于是他发现了“自我”。对“自我”的崇拜是青年巴雷斯表达对当时社会衰败的困扰的一种方式。他的第一个三部曲小说《自我崇拜》也正是发表在这样一个被衰败困扰、寻求自我解放与自我崇拜的年代。

巴雷斯的“自我”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自私”或者“利己”,而是有其独特的内涵。首先,巴雷斯的“自我”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1884年,他在《墨迹》杂志上这样说道:“法国是伟大的,德国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更接近明天的世界主义,而不会是昨天的沙文主义。”<sup>[9]32</sup>他强调要“对所有的思想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要使法国成为一个既“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对手的民族”<sup>[9]38</sup>。甚至在参加布朗热运动期间,巴雷斯仍然在对德态度上与其后来的同盟者戴鲁莱德(Déroulède)等好战派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戴鲁莱德及其领导的爱国者同盟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以民族复仇和民族战争为叫嚣口号,本质上是以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来实现法兰西民族的荣耀。而巴雷斯在当时却是一个理性的、超越当时喧嚣的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不认同戴鲁莱德式的极端片面、毫无原则,甚至扭曲事实、恶意诋毁对手国家的爱国方式;也厌恶他创作的关于战争的诗歌。巴雷斯极具讽刺地写道:“(他应该去读)一些关于诗歌创作的文章,好让自己学习不要写诗。那才是爱国的表现!”<sup>[10]</sup>巴雷斯认为,想让法国重新恢复民族自信心,重现法兰西的伟大,不能仅仅限于每天招摇、形式化地喊空口号,而要提升人们爱国主义的精神境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发现“自我”、解放“自我”,使“自我”摆脱衰败的社会现状。

其次,巴雷斯的“自我”是传统主义的延续,具有

反工业化、反现代性的特征。巴雷斯极度厌恶社会的“现代性”——工业文明、技术革新。在其《备忘录》中,他坦言“现代性精神”不但经过“各种道德装饰”,而且还是“无纪律的”<sup>[11]</sup>。他认为“现代性”这个词本身就是贬义的,“现代性”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个人意志的被操控。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隆隆机器在人们心底掀起一重重恐惧感与危机感。加上之前所讲的十九世纪末社会的普遍衰败和颓废之风气,以及虚无主义的到处弥漫,使得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急于寻求一种“自我”解放与“自我”认可的方式,最终实现“自我”意识的重建与完善。这也是巴雷斯把他的第一个三部曲小说命名为《自我崇拜》的原因。

最后,巴雷斯的“自我”永恒存在于与“野蛮”的对立中,其最终要旨是要保持“自我的完好性”<sup>[12]</sup>。“自我”是世间万物中唯一的现实,除了“自我”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野蛮”的。他认为:“野蛮是捉弄和刁难个人的整个环境,是个人的或集体的‘非我’,是对‘自我’的损害和反抗。所有一切可能成为‘自我’的阻碍力量的事物或力量都是它的敌人。”<sup>[13]</sup>因此“自我”努力透过荒芜的表象,摆脱虚无主义肆虐的环境,发掘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为了不让周围的“野蛮”入侵纯洁高尚的“自我”,必须要主动出击,消灭“野蛮”。巴雷斯写道:“我精神的永久动力,就是想成为一个自由人。只要我像洛林人一样,花同样的精力与毅力去抵御野蛮人与外族人的侵蚀,我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人。”<sup>[14]158</sup>

1889年,27岁的巴雷斯发表了《自我崇拜》的第二部《自由人》,一时间被青年人奉为巴黎拉丁区的“青年王子”。“他不但写出了到目前为止从未有过的作品,还有一腔改变世界的热情。”<sup>[15]</sup>他出入巴黎知识界的高级沙龙,评论家罗贝尔·德·博涅尔在《高卢人》对上对他大加夸赞,大文豪雨果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与左拉、布鲁姆、布尔热、勒孔德等人都关系甚好。

“自我崇拜”阶段的巴雷斯最终以投身布朗热运动来对抗“野蛮”,实现“自我”之存在价值。作为布朗热运动最大的鼓吹者,巴雷斯曾说:“我相信我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摆脱当前笼罩她并玷污她的野蛮。”<sup>[16]59</sup>这里的“野蛮”,主要就是指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政体。巴雷斯认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应归咎于平庸无能的议会民主制。他指责议会制下的政府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他们终日勾心斗角,从来不会协商一致

以服务公众,只会相互耍弄。”<sup>[16]60</sup>巴雷斯把布朗热运动看成新一代青年人给法国发出的信号,认为他们是法国的新生力量,是法国的未来,是让法国摆脱议会制的嘈杂处境的生力军。以巴雷斯为代表的这些“自由人”就像一匹匹战马,企图在第三共和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冲出突围,驱逐现存制度下的一切“野蛮”,重建文明的“自我”系统。一言以蔽之,巴雷斯的“自我”以世界主义与传统主义为导向,并非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基于整体主义的某种个人自由,最终诉求的仍然是围绕整体利益的个人价值。这也是其“自我崇拜”的个人主义转变为“故土与祖先”的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

### 三、民族主义的转型:“故土与祖先”

随着布朗热运动的破产,以及1899年戴鲁莱德军事政变的失败,巴雷斯发现要永久地保护“自我”不受“野蛮”的侵犯,仅仅追求当一个“自由人”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用民族主义的理论武装法国民众、统一民众意识,最终实现政治变革。于是,他开始在“自我崇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地推出了他的理论核心思想——“故土与祖先”:“自我”必须扎根于过去,个人必须融入民族,才能实现价值的永恒。“不管个人如何完美,都只是比他更完整地系统——种族的一小部分,而种族自身也只是上帝的一个部分。”<sup>[14]187</sup>由此,在巴雷斯的思维里,自我崇拜转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从对个人主义的“自我”的崇拜与防卫,到对集体主义的“自我”的崇拜,后一个“自我”是在过去与传统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是民族主义的“自我”。个人主义的“自我”受社会大集体的支撑与滋养,并完全融入在集体主义的“自我”之中,他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简单成份。因此,集体高于个人之绝对优势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巴雷斯就这样把“自我”的概念从个人主义提升到集体主义,给予“自我”与“野蛮”之间的斗争一种符合自然法的内涵。“自我”的语义也得到扩张,从个人指向民族。而“野蛮”,不但指一切荒芜、颓废、衰败的精神状态,更指外族、外国人;他非但没有摆脱传统的法国中心论、种族优越论的俗套,还借助哲学和精神层面的剖析方法,把“野蛮”提升到与个人发展和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理论高度。

1899年,正值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作为反德雷福斯派首脑的巴雷斯在法兰西祖国联盟的一次报告会上全面推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这篇报告的标题就是《故土与祖先》(《La Terre et les Morts》),副标题

为《法兰西观念建立的基础》(《Sur quelles Réalités Fonder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sup>[17]</sup>在这篇长达30多页的演讲稿中,巴雷斯首先重温并强调了法兰西祖国联盟的宗旨“维系和加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民族军队的敬仰之情”<sup>[17]3</sup>,然后他借用竞争对手普鲁士的经验教训,指出要改变法国目前的衰败现状就必须要把法国分散的各方力量集中在民族这一个中心点上,实现国家复兴:“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之情所蕴含的力量胜过任何一个雄辩的国务活动家所起到的作用。”<sup>[17]4-5</sup>因此“要用理智替代情感,并且为了使她更强大,要使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智慧相结合。要把各种分散的力量在民族的头脑中有机结合起来。”<sup>[17]10-11</sup>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这个既没有组织性也没有武装起来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呢?必须要建立起一种法兰西观念:“没有什么比来自祖先的声音更有助于建立一个民族的精神。土地传授给我们一个信条,我们是祖先的延续。这就是我们要建立法兰西观念的基础。”<sup>[17]120</sup>

在同年年底,巴雷斯还另外一篇文章中更加直接明了地阐释了民族的地域和血缘特性:“不管法兰西血统最初是什么样的,今天,这种血统存在着一种普遍特质,有别于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和撒克逊血统,而且这种血统还在人们的外部特征上表现出一些相似性……此外,我们还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听到相同的声音,见到相同的人与物,接受相同的教育,操着相同的语言,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共同见证着我们民族的兴衰,慢慢地我们便形成了相同的感受方式和反应机制。”<sup>[18]</sup>显然,巴雷斯的“故土与祖先”思想深受受泰纳“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的影响。泰纳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由其人种、生存的环境和时代所决定的,扎根于传统文化的社会或个人,一旦脱离了养育它或他的故土、种族,那就会迷失方向,失去自我。而巴雷斯则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是祖先的延续,离开了祖先遗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个人将无从存在与社会中。除了小说、报纸、政论演说之外,巴雷斯还有一个实践其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那就是爱国者联盟。他与该联盟的主席戴鲁莱德一起,利用爱国者联盟的众多会员,在议会、在公墓、在教堂控制舆论导向,甚至公然发动军事政变。

巴雷斯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十九世纪末法国民族主义的转型。其一是民族归属判断标准的转型。法国是政治民族主义的典型,即:“民族”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以理性、自愿的方式所组成的集合,个

体对某个民族的归属因此也是可以撤销的，这是契约式的“民族”理念<sup>[19]</sup>。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公民投票”<sup>①</sup>——概括了近代法兰西政治民族主义内容的核心，即公民可以依据其“政治意愿”决定其自身的民族归属。这种民族价值取向构成了自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第三共和国的前期，这种核心价值却一再被破坏。而巴雷斯就是最大的“破坏者”之一。他跟德律蒙（Drumont）等“法兰西民族优先论”者一起，宣扬“法国人的法国，外国人滚出去”的论调，成为法国十九世纪尤其是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巴雷斯把像左拉一样的知识分子、犹太人和耶稣教徒统统视为反民族的“坏法国人”<sup>[2]45-46</sup>，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无根者”，他们“丝毫不会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国旗和荣誉一词所感动，而这些都是最能触动我们心弦的东西。”<sup>[20]144</sup>巴雷斯摈斥理智主义者认为的国家应该建立在理性与逻辑之上的看法，而是强调本能、传统和对故土的热爱才能构成有血有肉的民族，思想必须要有感情的力量才能团结一致。他为“法兰西种族”的缺失而扼腕叹息：“唉，根本不存在‘法兰西种族’。”<sup>[17]7</sup>巴雷斯的最终诉求是要通过人为努力建立起一种同属于一个人种的意识，一种法兰西种族民族主义，以拯救“被分裂、被切除了大脑的法兰西”<sup>[20]71</sup>。在不知不觉中，巴雷斯把民族是一个“政治范畴的集体”的概念转换成“故土与祖先”的理论，同时也从民族的政治特性过渡到血缘和地域特性，并且使十九世纪末法国民族主义在反议会制的基础上，镀上了一层种族主义的色彩。

其二是个人与民族二元关系的转型。个人自主和个人神圣的理念源于启蒙时代，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则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给予保障，任何社会或政府不能不公正地对待它的公民。但是以巴雷斯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却强调民族对于个人的绝对优先权。他们宣扬民族生存的绝对需要，为了民族的利益可以抹杀个人的权益，军队和教会是民族大集体生存的保障机制，因此也应加以维护，哪怕牺牲个人利益。巴雷斯在其小说《无根者》（Les Déracinés）<sup>[21]</sup>中想象出了一个体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场景——参观泰纳先生的梧桐树：“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小角色，并且像这棵树上每一片微微颤抖的叶子那样行动；让树叶明白自己对梧桐树的依赖关系，明白梧桐树既有利于它们的命运，又限制着它们各自的命

运，既产生了它们各自的命运，又包容着它们各自的命运，这将是令人愉快而又高尚的事，一件充满了神圣的高尚而又愉快的事。”<sup>[21]203</sup>《无根者》发表于1897年，当时法国正处于被德雷福斯案件搞得四分五裂、混乱不堪的局面。“泰纳先生的梧桐树”其实就是想告诉法国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护树叶的利益而损害大树的利益，那是本末倒置；同样的道理，保护德雷福斯的利益而损害法国民族的利益，这是最没有意义、最危险的事。由此可见，在找到了“故土与祖先”之后的巴雷斯已经从一个强调个人情感，追求“自我”解放的个性青年，一个向往“自由人”生活的世界主义者，蜕变成一个把民族利益完全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和笃信“血缘宗亲”与“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

#### 四、结 语

巴雷斯的思想中存在一种连续性，并一直贯穿于他的作品中。从最初的《墨迹》到《自由人》和《蓓蕾妮斯的花园》，再到《无根者》，我们可以清楚地摸索出巴雷斯思想中从个人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脉络。虽然他的第一个三部曲小说只涉及到与个人主义相关的个体内心思考，但这些正是后来更深刻的民族主义考量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最初的“自我”逐步演变成“我们”，个人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相应地，“个人精力”最终也升格为“民族精力”。但是“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必然会走向民族主义，也必然是激进、狂热且排外的。巴雷斯的民族主义思想重视血统与秩序，藐视理性与正义，个人为下，整体为上，带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在巴雷斯之前，法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追求的都是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大繁荣，捍卫法国的民族权利的同时也捍卫其他国家的民族权利，是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紧密结合的，是大革命精神的体现。而巴雷斯却把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把“利己”置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漠视其他民族的命运，视军队和军事力量为至高荣耀，要求个人权益让位与民族利益。总之，巴雷斯把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民族主义传统完全倒转过来了。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1870年至1918年

① 这是1882年3月勒南在索邦大学演讲时说的一句话，演讲的题目是《为何民族？》，笔者参考的版本是2011年版的。Renan E. Qu'est-ce Qu'une Nation? Suivi de Le Judaïsme Comme Race et Comme Religion[M]. Paris: Champs classique, 2011: 75.

是民族主义的转型期,欧洲老牌国家的民族情感在19世纪10年里迅速右转,成为右派人士挥舞的大旗。”<sup>[22]</sup>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带给人类的是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

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更以民粹主义的形式死灰复燃<sup>[23]</sup>: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大言不惭地抛出“美国人优先”的言论;同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特别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整个过程中法国极右势力的崛起,难免让人感觉到巴雷斯政治思想的余音。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法兰西的女儿”自居,化身为当今“贞德”,企图以此来收拢人心,其排外、保守、狭隘的民族观念延续了巴雷斯“故土与祖先”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从2018年11月发起至今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对马卡龙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的法国政局如履薄冰、步履维艰。类似勒庞一类的巴雷斯的后继者们将会改变法国的政局吗?如今欧洲的民粹主义究其本质与当年巴雷斯时代的民粹(布朗热运动)颇有几分相似。他们都是披着民主的外衣,利用普罗大众对政府的不满,企图推翻现行政府,实行专制排外的独裁统治。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曾经给法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何应对当今蛰伏后苏醒的民粹主义是新的课题,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 参考文献:

- [1] Sternhell Z. La Droite Révolutionnaire: Les Origines Françaises du Fascisme[M]. Paris: Seuil, 1978: 406.
- [2] Michel Winock M.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M]. Paris: Seuil, 1999.
- [3] 陈剑. 巴雷斯:法国民族主义的先驱[J]. 岱宗学刊, 2010, 14(4):46-48.
- [4] 郑妍. 巴雷斯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初探[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8.
- [5] Barrès M. Les Amitiés Françaises[M]. Paris: Juven, 1903: 23.
- [6] 宋玉芳.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共和爱国主义教育[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18, 305(3):21-28.

- [7] Barrès M. Le Sentiment en littérature. Une nouvelle nuance de sentir. M. Leconte de Liste[J]. Les Taches d'encre, 1885, 4(1): 33.
- [8] Barrès M. Préface au Monsieur Vénus Rachilde[M]. Paris: L. Genonceaux, 1902: 17.
- [9] Barrès M. Un mauvais Français: M. Victor Tissot[J]. Les Taches d'encre, 1884, 4(1).
- [10] Barrès M. Gazette du moi[J]. Les Taches d'encre, 1885, 4(1): 47.
- [11] Barrès M. Mes cahiers 1896—1908 (vol. 1). Préface de François Broche, Notes de Philippes Barrès[M]. Paris: Editions des Equateurs, 2011: 427.
- [12] Barrès M. Le Culte du Moi: sous l'Œil des Barbares[M]. Paris: Alphonse Lemerre, 1888: 165.
- [13] Sternhell Z. Maurice Barrès 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M]. Paris: Edition Complexe, 1985: 51.
- [14] Barrès M. Le Culte du Moi: un Homme Libre[M]. Paris: Perrin, 1889.
- [15] Colin J P. Maurice Barrès, le Prince Oublié [M]. Paris: Infolio, 2009: 47.
- [16] Barrès M. M. le général Boulanger et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J]. La Revue Indépendante, 1888, 8(6): 55-63.
- [17] Barrès M. La Terre et les Morts; Sur quelles Réalités Fonder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R]. Paris: Bureau de La Patrie français, 1899.
- [18] Barrès M. L'Education nationale[N]. Le Journal, 1899-12-30.
- [19] 张金岭. 法语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9(12):47-52.
- [20] Barrès M. 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M]. Paris: Félix Juven, 1902.
- [21] Barrès M. Le Roman de L'énergie Nationale: Les Déracinés[M]. Paris: Fasquelle, 1897.
- [2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0.
- [23] 彭姝玮. 法国总统及立法大选与法国政党的演变[J]. 国际论坛, 2018, 20(6):67-73.

(责任编辑:王艳娟)